

终结本质主义时代的努力

——对波普反本质主义思想的一种解读

姜延军

(南京政治学院 南京 210003)

内容提要 本质主义代表着一种寻求确定真理的古老科学理想。翻开人类认识史,几乎在每一个历史时段都可以看到这一原则的印迹。虽然随着其追求绝对、确定、终极所导致的现实弊端的不断暴露,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此原则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但这种反思主要是在后现代主义阵营进行的。波普则立足于现代性理论对此原则作了深刻的终结性的批判。本文试图从本质主义的角度对哲学史作一梳理,并以此确立波普反本质主义思想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进而得出有益于我们实践的启示。

关键词 波普 反本质主义 批判 终结 哲学史

有些人可以用自己的一生告诉人们整个世纪的历史,卡尔·波普爵士(Karl R. Popper 1902—1994)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不是眼光狭小、关在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一位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科学家和具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思想家。他的“学说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人们具有显著的实践作用。它改变了他们从事自己工作的方式,因而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①。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尤其是1997年2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人们重又对这位证伪主义大师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兴趣。

众所周知,波普的理论素以批判和否定著称。如果我们纵贯性地分析其整个思想和著述,便不难发现,这一特点鲜明体现于一个贯穿波普理论始终的理论取向——反本质主义。这一独创性思想成果,对于证实原则和本质主义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批判意义,大大推进了人类思想的进程,在历史上终结了一个时代,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路标。

一、前波普时代——本质主义的历史考察

“本质主义”一般是作为逻辑概念被经常讨论的,波

普所批判和反对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则主要是指那种肯定事物的本质永远不变,认为科学家能够通过认识本质最终成功地确立理论的真理性和克服一切合理的怀疑,从而获得“终极真理”的观点。^②因此,应该肯定,波普的反本质主义首先不是本体论的,而是认识论的。在波普看来,寻求绝对确定的终极真理是“古老的科学理想”,确定的本质、因素和形式一直是认识论研究的主要焦点,翻开哲学史,几乎在哲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可看到“本质主义”的身影。甚至早在前哲学史的神话时期,人们就已经通过依附和尊崇大地而表现出寻根溯源的本质主义思维倾向。

(一)理念本质主义

波普认为,本质主义思维最早“植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③,他们“教导说,科学研究必须深入事物的本质,才能解释它们。”^④我们知道,由于当时抽象思维发展程度极为有限,希腊人还不可能对自然界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只是从表面和总体来把握对象世界。古希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大都认为,认识的终极任务就是去回

答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背后的统一基础是什么,即把握“杂多”中的“一”。于是,虽然古希腊人眼前呈现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⑤,但其认识活动却从属于思维对宇宙本体、万物本原统一性和确定性的把握。也就是说,由思辨的综合自然观支配着的希腊认识论,却自发地孕育着对思维确定性追求的内在冲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本质主义的自然倾向。

“万物皆流,无物常驻”是辩证法奠基人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他坚持“变”的哲学,但他不同意把认识停留在瞬息即逝的散乱现象上。他认为存在着某种永久、确定的东西,即不断变化着的火的运动规律——“逻各斯”。逻各斯虽不是巴门尼德式的实体性的永恒,却也是一种运动过程的永恒。由此可见,赫拉克利特主张在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中寻找某种确定的东西,根本上仍是一位本质主义者。与之相对立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尽管处处透着一股神秘主义,但他们的目的依然是力图使人确信,只有理性的沉思才是达到对世界确定性认识的惟一来源。

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建立完整哲学体系的哲学家,柏拉图建构起两个世界:由感官所能感知到的所有现实事物构成的感性世界,和只能由精神来设想、派生感性世界、成为感性世界存在物的原型的理念世界。关于变幻不定的感性世界的认识只能得到虚妄“意见”,对秩序井然的理念世界的把握才是真正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引用著名的洞穴比喻来说明自己的本质主义思想。不仅一切事物只有分有理念世界的本质才能存在,而且一切真正的认识,不管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也只有相对于本质才能产生,对事物的所有判断都是以我们认识其本质或认识其某种特性的本质为前提的。

亚里士多德虽然批判和摒弃了他老师关于理念世界的假说,然而他还是从柏拉图的本质主义哲学那里继承了不少东西。(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根本就没有推翻这座本质主义的理论大厦,而只是将更多的努力放在了“调和”两个世界的问题上。)在其体系中,不仅本质的世界存在着,而且还存在着一个具体的世界,本质在个体事物的身上实现着。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说法,只有一般与必然才称得上是科学。当然,他不再像柏拉图那样认为科学就在于达到对于某个神秘的本质世界的凝视,因为本质不再脱离存在物而单独存在,除了观察我们经验到的存在物之外,我们的认识没有别的来源,但科学家的任务是从中揭示本质的特征。

亚里士多德之后,古希腊认识理论的发展便较少独创性的见解。稍后于亚里士多德的伊壁鲁鸟学派和斯多

葛学派,也只是在批判继承柏拉图哲学的过程中,发展了认识论中本质主义思维。

值得一提的是,希腊晚期的怀疑论者破除了人们对自身认识能力的盲目乐观,这或许是对古希腊学者各自沿着片面道路追求本质确定性的一种否定的理论补偿。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扭转人们的思维方向,而只是迫使人们从一个新的却是更加极端的角度去继续本质主义的道路。

(二)神学本质主义

公元7世纪到11世纪,欧洲社会几乎回到了希腊文明出现之前的蒙昧状态。在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哲学思维都是为了认识上帝”的。^⑥哲学对认识活动的反思,不得不屈从于对教义的论证,以及调和信仰与理性矛盾的目的。不可避免地,“上帝”替代了古希腊的“一”而越发地彰显出来,一切都被归结为上帝的启示,一切知识都成为人们了解上帝这个绝对本质的手段。人类知识的本质性、确定性成为论证上帝存在的重要根据之一。

如果采用奥古斯丁的断句法,那么本质就存在于上帝的意志之中:“万物都是藉着他创造的;凡被创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创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⑦一切事物之所以能存在只是由于它们分有了上帝的意志,上帝意志是一切现实事物的源泉。这就是为什么耶和華用“我就是我”来给自己下定义。^⑧从某种意义上讲,奥古斯丁的理论远不及柏拉图的理论中具有的本质主义的色彩重,因为在奥古斯丁的理论中,本质仅仅是上帝(意志),既不表现为事物,也不构成一个世界。然而,本质仍然起着主要的作用,一切存在的事物无不自来于本质世界,并且只有达到事物的本质而非事物本身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理智认识。而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人:要认识人的本性并懂得人的行为应当如何,就必须参照造物主的意志。

如果说,奥古斯丁承袭和修改了柏拉图的哲学,那么,托马斯·阿奎那则费力地使人们接受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一直坚信只有通过存在着的个体才能形成表示本质的理念。但由于理智以普遍与必然为其直接的对象,所以普遍与必然便构成了科学的直接对象,人们只有通过偶然的现实所包含的必然才能对之有科学的认识。由此,他在道德领域强调,上帝在创造我们时便要求我们去适应我们的本性(即从上帝本身的理性那里所分有的理性)而生活,上帝还使我们去实现我们所设想的理想的人类类型。

从总体上看,奥古斯丁的思想一直是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那时的人们热衷于认为,人另有一种微妙的

功能,如“智慧”、“德行”、“贯透之眼”等等,这种功能可以达到非创造的领域,达到本质,甚至以某种方式达到上帝本身。因而人们常说,人“位于两个世界之间”:由于人的低级部分,人被固定于存在的世界中;而由于人的高级部分,人又上升到本质的世界。

当然,此处对中世纪的论说,只是从一般的角度对那个时代所作的总体描述,我们并不简单地认为中世纪哲学甚至整个时代毫无积极意义,否则,就没有办法理解伟大的文艺复兴何以产生。仅就经院哲学而言,应该承认,其内部围绕共相和殊相关系而形成的唯实论和唯名论的斗争,大大推动和加速了科学与信仰的分离;和以罗伯特·格罗斯代特、罗吉尔·培根为代表的实验自然科学思潮一起,为近代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也将使西方本质主义思维传统以一种全新的形态表现出来。

(三) 科学本质主义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自然科学和认识论的发展重新获得了自由。尤其是培根和笛卡尔,他们挣脱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体系的束缚,抛弃了经院哲学的实体形式,并对经院哲学家用以解释实在的形而上学的原则表示了怀疑。然而,关于什么是科学,人们常常还在疑问:“历史是一门科学吗?”这显然是因为历史这个称呼在他们看来是有争议的。同样,人们对社会学被理解为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和对确凿事实的分析也可以议论一番。但相反却没有人怀疑数学、物理学等的科学性质,因为这二者都研究人们所普遍认同的那种本质。可见,近代人所理解的科学依然对本质的精确把握表现出太大的兴趣,依然是本质主义的。

作为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培根一生所致力的是,在批判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归纳逻辑。为了排除表象的偶然相关,克服经验归纳的不确定性,培根还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以达到本质相关的确定。这种近代本质主义经验论传统在洛克那里达到了最高水平,他在《人类理解论》中多次申明其哲学的目的是探讨人类知识的起源、可靠性和范围。虽然洛克将理性区分为必然性和或然性两种,蕴涵了许多合理的思想,但遗憾的是他所强调的仍然是必然性的知识,而他关于或然性知识的思想却成为了导向唯心主义经验论和不可知论的指路牌。贝克莱和休谟就分别沿着这两条路走了下去。

笛卡尔虽然在“普遍怀疑”原则的指引下,把通过直觉而确立的“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的第一原理和出发点,然而其目的却恰恰是为了达到认识的确定和明晰。(简单地讲,只是在达成这一目的的方法上将培根的科学金字塔倒转了过来。)按照这一思路的合理推论,必然如斯宾诺莎一样导出一个无穷系列的创造者——上帝。

休谟虽然没有像古代怀疑论那样极端(认为人甚至不能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但他却使近代科学走进了死胡同,因为他否认我们能够通过逻辑推理从知觉经验进到关于外部世界的任何真实的知识。同样,被休谟从独断论的睡梦中唤醒的哲学家康德,虽把长期对立的感性、(知性)、理性结合了起来,却在开启无限可能性的同时剥夺了科学活动的根本可能性——“自在之物”永远地与此岸世界相分离,人类失去了科学进步的希望。或许我们可以说,黑格尔重新架起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相互过渡和转化的桥梁,也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更勇敢地提出了“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原则,试图在历史中找到向着精神的实现迈进的思想进程,为本质之外的东西寻求一小块领地;但他着力强调和论述的无疑是,理性作为自我意识和一切客观现实的最内在本质构成一切确定性和真理的源泉。

应该承认,休谟和康德的认识论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他们以后,在科学中再没有人能简单地坚持绝对确定性的要求,正如没有人再坚持最后说明的要求一样。然而他们没能对本质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系统批判,使本质主义思维得以峰回路转,重又由外回向内,去追求具有本质意义的逻辑真理和直觉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直到19世纪为止,古典哲学对本质占首位这一点没有表示过怀疑。”^⑨

(四) 逻辑本质主义、直觉本质主义

西方哲学的现代发展,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风貌,现在还很难对其作出较为全面准确的描述,然而波普之前各流派的本质主义倾向却是模糊可见的。如果允许我们简单地将其划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则它们的理论指向分别可以概括为逻辑本质主义和直觉本质主义。^⑩

以孔德和马赫为代表的第一、二代实证主义者,强调经验的客观性(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以探求经验范围内的确凿知识为己任,力图恢复由休谟打碎的人类知识的可靠性。他们把科学符号、术语、公式和方法加之于哲学,将哲学改造为所谓严格的“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并企图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整个肯定科学知识客观性与确定性的理论大厦。

随着弗雷格和罗素的现代数理逻辑以及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即语言分析的思想的发展,强调以逻辑分析为手段,研究科学理论中概念、命题、语词之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逐渐兴起,由此,哲学变成了科学逻辑——“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按照这种分析哲学的观点,清楚而精确的证实是哲学本身所要求的。“为找到某种必然为真的东西的需要所驱使,罗素发现了‘逻辑形

式，……对这些特殊表象的发现，再一次开始了对严肃性、纯粹性和严格性的追求。”^⑪ 其后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从这种把逻辑看作是世界本质的立场出发，强调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两个前后相继的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即科学发展的实质——逻辑活动是规范性的和严格的，具有确定不变的模式。

甚至连非常注重变化的“历史研究方法”也受到这种本质主义观点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合理化思路是：一方面，“在每一项变化中，必定有某种事物在变。即使没有任何事物是始终不变的，但是为了到底能谈变化，我们就必须能够认同什么已经改变了。”^⑫ 所谓对事物的认识就是深入把握事物内在稳定的东西（本质）；另一方面，事物的本质是通过它的历史变化而展现出来的，因此为了认识事物的本质，才去研究它的历史变化。^⑬ 这一点一直到阿尔都塞那里还留有很深的印迹。

在另一个方向上，我们姑且暂不提柏格森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对直觉的张扬，仅来看一下影响深远的现象学运动。我们知道，使胡塞尔达到现象学观点的，是关于与精神生活的内心世界相对立的外部物质世界的存在的争论。为了从笛卡尔的出发点重新讨论这一问题，胡塞尔决定把所有涉及物质或精神的存在问题以及一般的成见都悬置起来，只对直接经验到的现象作描述性研究。不过胡塞尔并不倾向于怀疑主义，相反他试图达到真理，达到在意识与事物发生关系时出现的意识活动的“结构”本身，他把这些结构叫做本质，在他那里，这种本质将通过称为“本质的还原”的直觉活动在具体的场合下直接地把握到。为此，他把自己极力把握为纯粹的自我，即独立于来自对象的规定性。

在最具有代表性的存在主义那里，存在不仅是某物的存在（否则便不能谈论存在），而且是比存在物的事实更为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并不是对随便什么事物的存在感兴趣（譬如一棵树的存在），对于他们重要的是人的存在，所以本质才是第一位的。即使萨特在“自为存在”领域提出了给本质主义以严重冲击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但他所追求的仍然是“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统一。也就是说，他所努力去获得的知识，并不是认识所存在的存在者，而是去认识一切可能事物的普遍与必然的规律，就像海德格尔用一种神秘“出窍”的方法去认识存在者的一般类型一样。

二、波普——迎接‘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⑭

波普是从科学经过科学史走向科学哲学的。由于深远的历史传统，本质主义广泛流传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科研活动之中，“人们几乎普遍相信词的意义，尤其是定

义的重要性。”^⑮ 这使波普在很年轻的时候便感到了一种无奈的失败感，并且这种感受在以后的数年中经常萦绕在他的脑际。

现代自然科学证明，客观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起来的、处在不断发展之中的画面。连续性和离散性（不连续性），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是宇宙运动的基本特征。人类认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实质上正是对这一宇宙运动基本特征的客观反映。当意识反映宇宙间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着的事物时，人们常不乏这样的体验：在一般粗略考察过程中，我们容易觉察出两极的对立，事物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清晰的。然而一旦深入仔细地研究，又会发现对立的两极往往是不可分离的，界限又变得模糊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面对深厚的思维传统，波普不屈不挠地表达出自己反本质主义的声音，而且如波普所言，这个声音对其后来的哲学家生涯是极为关键的。^⑯

（一）理论是大胆的猜测——批判认为经验和理论之间存在着确定不变的逻辑关系的立场

首先，波普确认经验是证伪或证实理论的基础，反对追求确定的逻辑真理的无益研究。在其接触到本质主义之初，波普就发现，由于“词”相对于观念更客观和较不涉及发生的问题，“那些过去认为‘观念的新方式’是惟一的哲学的真方法的人，因而转变为相信，‘词的新方式’是惟一的哲学的真方法。”^⑰ 他强烈反对这一信念，并规诫自己：“决不要让你自己被驱使去认真考虑词及其意义的问题。必须认真考虑的是事实的问题和关于事实的断言：理论和假说，它们解决的问题以及它们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咬文嚼字地在纯逻辑层面上纠缠于词的意义，只能是“一条走向理智毁灭的必由之路”。^⑱ 其次，波普坚决贯彻证伪原则，否认经验与理论之间具有确定不变的逻辑辩护关系。他认为，从科学实在论的观点来看，理论对经验永远是极度头重脚轻的。经验只能告诉我们个别的知识，用逻辑术语讲，它们只是有限数量的单称陈述（具体陈述），而且经验证据是永远含有误差的报告；但科学理论却不应是这类个别知识，而应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即应是全称陈述（普遍陈述）。有限不能证明无限，过去不能证明未来。因此，经验的观察和描述不能提供本质主义的知识成果。再次，波普坚持观察与理论不可分割性，反对科学语言“双层模型”论。他强调，没有纯粹的观察，观察总是在一定的理论或观点的指导下进行的，总要受到理论沾染。因为人们不是为了观察而观察，而是为生活、为科学研究而观察，因而观察通常总是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选择性的；更重要的是，科学的观察都是理解中的观察，都依靠一个概念结构，任何描述都必须使

用普通名词。总之,在观察和理论之间,并不存在着确定不移的逻辑天堑。第四,波普反对概率真理论,认为概率解释也无助于从逻辑上拯救经验与理论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按照他的观点,一个理论的一切被接受的经验推断不能给它提供真正的支持;任何两个逻辑地独立的经验推断也并不给它提供同等支持,这就摧毁了逻辑经验主义者追求理论和经验之间确定的、超历史的逻辑关系的重要依据——“证据权衡”的纯逻辑主义立场。波普甚至指出,即便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不是经验的重复产生心理信念,而是心理信念产生经验重复。所以,无论是经验的心理学解释,还是概率逻辑的弱化原则,都无法说明本质主义的合理性。

(二)从错误中学习——强调从科学理论发展的动态模式来考察知识的发展

首先,错误是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我们的知识增长是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尝试中实现的。由于科学理论只是假说,为了证明某个假说,我们就需要另一个假说,进而我们又必须去寻找第三个内容还要丰富的假说,以此解释为何原先两个假说每一个都在有的环境中起作用,而在另外的环境中不起作用;当然,它也能使我们说明新的情况。波普认为,在这种连续性的说明中,每一说明都会得出各种推论结果,这些推论结果超出了现有的例子:我们的理论无论真还是假都将告诉我们更多的关于未知世界的知识。我们检验理论的方法之一是设想出它的推论结果与新观察经验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然而重要的是,要收集有利于我们证明某个陈述的例子,即使是成千上万也是毫不困难的,可是正面的例子从不会使我们怀疑,更不用说纠正原有陈述的不当之处,因而我们永远也无从实现超越而达成知识的增长——除非在寻找正面例子的过程中偶然遇到了一个反面例子。假如我们发现理论告诉我们的某些东西与事实不符,那么这就是新的发现,它就增长了我们的知识,它就会使我们重新开始探求更好的理论。正是基于此,波普强调理论始于问题,这就形成了他自己的反本质主义的知识增长模式和方法。

其次,批判是真正的科学理性精神,只有在严肃的批判中尽可能地清除错误才能更接近真理。波普的科学观和科学的历史密切相关,他认为科学的目标不是追求确定不移的知识,而是追求具有丰富经验内容和深刻说明力、可被证伪的假说。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他的兴趣在于越来越接近真理。因此,自由的争论、批判的精神对于科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每当我们提出对一个问题的解法时,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地去试图推翻我们的解法,而不是去保护它。”^⑩使波普深感批判精神恒久意义

的特殊例子是爱因斯坦对牛顿的挑战,在当时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科学等同于真理,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都属于科学,但是它们不能两者都是真的,也许它们两者正好是错误的。^⑪理论如果要对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法,就必须超越现有的知识,因而它需要一种批判的飞跃。理论越大胆,它就越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然而同时,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错误的东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我们必须严格地检验以便发现其正误,这就需要思维的独立性以及思想的不稳定的冒险性。这种深刻的批判精神——波普尤其强调对自己的批判——与一劳永逸的本质主义思维无疑是格格不入的。

(三)“来源”不等于“可靠”——反对通过直觉达成纯粹真理的信念

首先,建立理论的依据没有哪个是“绝对权威”。以往的哲学家多把“知识的来源”与“知识的可靠性”相混淆,经验主义者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因而经验知识是绝对可靠的;理性主义者认为知识来源于理性,因而认为理性知识(“直觉真理”)是绝对可靠的。波普则认为,“来源”与“可靠”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知识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既来自经验,又来自理性,也来自历史传统,还来自灵感,然而,它们没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不存在知识的最终来源,“我们应当做的是放弃终极知识源泉的观念,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人的知识;承认知识同我们的错误、偏见、梦想和希望混在一起,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探索真理,尽管它是不可企及的。”^⑫其次,科学家们的灵感、直觉只提供对问题的合理猜测,并不确保真理性。波普认为知识虽然有多种来源,但是有一种来源特别重要,那就是“灵感”。一个卓越的有创造才能的科学家,在创立一种理论时,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高度的思辨能力和传统知识,而且更需要一种神秘的灵感,理论的最初提出就是依赖于这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因素。然而,在波普那里,灵感和直觉只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探索常常为灵感激发,但我们必须提防这样的信念(尽管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它):我们的灵感带有权威性、神性或类似的性质。如果我们因而承认,在我们知识的整个范围内找不到任何不能批判的权威,无论它怎样深入未知的范围,那我们就可以毫无风险地保留真理超越人的权威这一观念。并且,我们必须保留它。因为,没有这种观念,就不可能有客观的探索标准;不可能有对我们猜想的批判,也不可能对无知的探索以及对知识的追求。”^⑬这样,波普根除了确定无疑的直觉真理的一切可能性,在更为系统的层次上阐述了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直觉本质主义给予了更为深刻的批判。

4. 理论只能确证,不能证实——恢复深刻性与确定性在认识论中的统一

波普认为,在近代科学发展中存在着两种相联系的传统。一是深刻性的传统,即认为按照培根和笛卡尔以来的理想,科学不仅是平凡琐屑的真理,而且能说明现象背后的本质,甚至能提供“最后”说明的真理。另一是确定性的传统,即认为科学不仅是真理,而且是已被认识和证明了的真理。波普指出,科学认识活动中,这两种理想虽然常常互相冲突(认识越要求深入本质,理论通常越具有猜测性),但是它们都以绝对、确定和证实为支撑,都体现了本质主义的追求。对此,波普认为,追求其中某一个而放弃另一个,或是将二者一并抛开,都不能使追求真理的理想更接近于现实。波普主张,认识只有放弃终极真理和高概率,才能大胆假设,理论信息内容才会丰富。实际上,在科学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加以永恒地建立,没有什么亘古不变,我们称之为知识的东西,本质上永远是暂时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说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是真的,科学理论作为假设,终有一日要被证伪,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因此,如果仿效科学家和哲学家,走他们一直走过的老路,即力图证明一种理论为真理或为我们所信奉的某种理论进行辩护,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这种尝试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然而,重要的是,虽然没有任何理论可以作为终极真理永远为我们所依赖,但是我们却可以说:它被迄今为止的每一个观察所证明;它比已知的别的理论提出了更多、更准确的预言。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证明一种理论较之另一种理论的优越性——如果一个理论在检验中产生的结果越好,那么与其它理论相比较我们就认为它得到了越好的确证。当然这不是通过增长新的确然性进行的。基于这种受到塔尔斯基影响的观点,波普认为真理“是一个调节性的观念”,我们不能由于精确性绝对得不到,就说尺度的精确性无关紧要;也不能说我们不能通过越来越大的精确度取得进步。^②波普提出确定性与深刻性相统一的新看法,对西方科学哲学甚至整个认识论研究来说,似乎都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于人们重新审视本质主义思维发生了很大作用。

第68页;《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无穷的探索》“注释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③④⑫⑬[英]波普:《历史主义的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6、68、70、7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⑥托马斯·阿奎那:《反异教徒大全》一卷四章二十三节。

⑦《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章,香港,1992年中英文对照版,第257页。

⑧参见:《出埃及记》第4章第14节。这是一种逻辑上对上帝必然地存在的论证。当我们说:“我是一个人”时,“我是”肯定了存在,“人”则表示本质。惟有上帝身上存在与本质是不可分的。

⑨[法]保罗·富尔基埃:《存在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⑩这种二分的概括是一种较为谨慎的做法,其启示和根据主要来自于:在数学基础问题上存在着的直觉主义、逻辑主义和形式主义之争——形式主义又往往表现出直觉主义的倾向,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希尔伯特就曾明确表示:“我甚至相信,数学知识终究是依赖于某种类型的直觉洞察力。”(转引自刘大椿主编《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将二者一并概括为“直觉本质主义”。(参见[英]L·乔纳森·科恩《理性的对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2—93页。)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分析哲学家也常常诉诸直觉,但他们归根到底所寻求的是确定不移的逻辑结构,直觉在他们那里只是手段,且直觉本身恰恰是非逻辑的。因此,这不同于在人本主义思潮中作为手段与目的相统一的直觉。

⑪[美]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6页。

⑭⑮⑯[英]波普:《无穷的探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2、14、14页。

⑰⑱[英]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英译本第1版序言,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0页。

⑳参见[美]怀特劳《爱因斯坦对我的科学观的影响——波普访问记》,载复旦大学哲学系编《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文集》,第205—210页。

㉑㉒[英]波普:《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2—43页。

①②[英]布赖恩·马吉:《波普尔》,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5页。

③参见[英]波普《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历史主义的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姜延军,1972年生,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学文]